

公有制企业产权治理结构有效实现形式的博弈论分析

王国成

摘要: 公有制经济的效率问题是经济学研究的跨世纪课题, 在新的世纪仍然是一个理论和实践中都需要努力解决的根本性问题。本文运用博弈论的理论和方法, 明确指出在研究公有制效率问题时所得结论对假设的依赖性, 用动态博弈模型和俗定理着重分析了现行公有制企业效率低下的根本原因在于未能按公有制的本质要求进行产权组织和形成治理结构, 进一步强调了只有建立真正使最终代理人成为初始委托人的双向委托代理关系, 才是有效发挥公有制优势的产权组织形式, 并探讨了双向委托代理关系的实现形式和途径。

关键词: 公有制企业 产权结构 委托代理 博弈论

社会主义的诞生和曲折发展是 20 世纪人类历史长卷中最伟大和最波澜壮阔的一幕, 而相应的公有制经济理论与实践等方面的研究, 可以说是经济学的一个凝重的世纪课题, 其中公有制经济的效率问题最引人注目。公有制经济在我国国民经济中是否能始终处于主体地位, 同样作为市场微观主体的国有企业在经历了三年的“脱困”之后, 能否在 21 世纪长期稳定地保持旺盛的发展势头, 对这方面问题的研究在新的世纪具有非常重大的理论价值和重要的实践意义。从最根本层次上看, 经济效率也是由制度安排所决定的, 是取决于产权配置和治理结构的形式与性质的。或许是理论研究的滞后和偏颇, 或许是社会主义实践的艰难曲折, 有那么一种观点似乎要证明公有制经济在制度安排和产权组织形式等根本问题上存在着先天不足或固有的弊端。然而, 本文却有着与之完全相反的观点和结论, 文中运用博弈论分析工具和方法, 在概述了动态博弈理论及俗定理的基础上, 通过对优化公有制企业产权治理结构的问题的讨论, 重点分析了影响现行公有制企业效率发挥的关键因素是委托代理关系等产权组织方式未能真正体现“公有”的本质特征, 提出了在我国只有坚定公有制的信念(真正地实现和坚持), 建立双向委托代理关系, 才是提高企业效率之根本。

一、动态博弈与俗定理

为了更好地说明公有制企业产权治理结构的内在机理, 分析产权配置如何会在提高企业效率中发挥作用, 概述下文所用到的理论和方法是很有必要的。

以研究策略相互影响的相关理性为基础形成的博弈论正在广泛而深刻地改变经济学, 而动态博弈是其最重要的理论组成部分, 对现实经济问题有很强的解释力。许多一次性(或有限次)博弈的结果达成的是非最优纳什均衡, 虽然还

存在着能够帕累托改进的可行策略组合和收益, 但由于其不稳定性而不能作为博弈均衡结果的实现。动态博弈理论对此作了深刻的研究, 揭示了无限重复动态博弈和静态或有限次博弈最根本的区别, 提供了一些非常有效的分析工具。其中的所谓俗定理(Folk Theorem), 表明了只要局中人有足够的耐心($\delta \rightarrow 1$), 任何符合个体理性的可行收益所相应的策略组合均可成为纳什均衡, 实现了对静态博弈中非最优纳什均衡的帕累托改进, 这是均衡实现的一个实质性拓展。在此将其基本形式表述为:

设有考虑时间因素的 N 人有限策略的博弈序列 $G_1, G_2, \dots, G_T$, 若 $G_i = G_j = G, i, j = 1, 2, \dots, T, T \rightarrow \infty$, 则得到无限重复对策。将具有折现因子 $\delta (0 \leq \delta \leq 1)$ 的无限重复对策记为 $G(\delta)$, α^* 表示具有支付 $e = (e_1, \dots, e_N)$ 的一次对策 G 所实现的纳什均衡, 在 $G(\delta)$ 中, 局中人 i 的总支付为 $u_i = \sum_{t=1}^{\infty} \delta^{t-1} g_{it}$, g_{it} 为在第 t 次博弈中局中人 i 的支付。若对 $v = (v_1, \dots, v_N)$ v (可行收益集), 且对所有的 $i (i = 1, \dots, N)$, 有 $v_i > e_i$, 那么, 存在一个 δ 使得对所有的 $\delta > \delta^*(v)$ 就有一个支付为 v 的子对策完美均衡。显然, v 是对 α^* 的帕累托改进。

然而, 现实经济活动与重复博弈的基本假设还有较大偏离, 任何经济活动都难以重复进行无穷多次, 虽可用大致相同的一类博弈来近似重复, 但无穷多次的要求在一般情况下是不可能实现的。由于在现实中基本上不存在真正的无限重复博弈, 所以在实际应用时就很难满足“无限多次”的条件, 这难以充分体现均衡实现的本质飞跃, 只是停留在理论意义上。应用中变通的方法要么是相对无限——整个博弈过程相对于一次博弈而言, 时间足够长, 次数足够多; 要么是预期无限的方法——不能预计博弈将在何时终止等方法来实现“无限次”重复。

不难看出, δ 是动态博弈模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参数。但从博弈论的发展情况来看, 未曾专门对影响 δ 值的大小和变化等因素进行较为深入的讨论。在本文的分析中, 不仅要从事经济行为方面考虑理性预期的足够耐心和偏好等因素, 还应从制度和机制方面考虑, 才能保证和实现 δ 足够接近 1。还应该看到, δ 也包含了对制度合理性的认同和信念的坚定程度等因素。当对某种制度充满希望、有坚定的信心时, 在不断完善的机制下, 局中人对未来会有更良好的预期。会有更加足够的耐心, δ 就更接近 1。反之, δ 就明显小于 1。

二、假设的偏离和结论的迥异

结论的迥异往往源于假设的分歧和偏离。对同一现象和事物的观察与分析能够得出不同结论, 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观察者的立足于何处和从什么角度来看。科学分析手段的可靠性和共同性是毋庸置疑的, 但感情立场和价值取向的不同必然表现为经济学分析时的不同前提假设, 同样是“科学”的分析而结论却大相径庭也就不足为怪了。就人的行为本性来看, 无论是性本善还是性本恶, 无论是唯心还是唯物, 从逻辑意义上讲, 都是假设和分析起点方面的分歧。从经济实践方面来看, 对经济形势的各种判断, 也是宏观调控政策分析制定的前提和假设。从某种意义上讲, 经济学发展的历史就是根据人类认识的逐步深化、实践发生的不断变化和提出的新问题, 相应地修正前提、规范假设从而完善经济理论体系的过程。特别是 20 世纪社会主义实践的曲折发展和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世界潮流, 向人们昭示了公有制经济实践在逻辑起点上的偏差, 所得到的理论共识就在于假设的基本条件未得以满足, 社会主义没能建立在比资本主义更发达的生产力基础上。可以说, 经济学正是因为基本假设难求统一, 所以至今还未称得上严格意义上的科学, 一只脚站在科学殿堂的大门之内, 一只脚在大门之外。而且, 就此意义而言, 经济学在 21 世纪也很难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

再如讨论国有企业改制时关于“靓女先嫁”还是“丑女先嫁”的争执和分歧, 如果不把国有企业看作是都必须嫁出去(而且还会嫁给一个好婆家)的姑娘, 而把它们(至少是部分)看作是能够顶门立户的儿女, 自然就不会存在谁先出嫁的问题了。还有在考察公有制的效率时, 曾有一种观点认为, 初始委托人的最优监督积极性和最终代理人的工作努力水平随公有化程度的提高和公有制经济规模的扩大而递减(在一定条件下)。认真分析这一结论的前提, 本来这是在各种所有制企业中都普遍存在的现象和基本特征, 任何企业中的各类人员, 若他们的实际收益并不能与企业规模的扩大成正比, 多劳不能多得, 资本等要素的多投入也不能多得, 自然会导致工作积极性和努力程度随规模的扩大而递减。这可从得出此观点的文章的分析中看出, 虽然它们也对公有制的制度特征加以概括, 但在展开讨论时并未用这些特征将公有制与私有制企业区分开来, 整篇分析不只是针对公有制企业而言的, 完全适应一般企业。原因在于不同的

价值取向和观点偏好, 先假定结论成立, 再证明结论成立, 隐含着循环论证的逻辑错误。实际上是持有这一观点的人硬性地将这顶对所有企业来说都不太好看的帽子只给自己在感情上不愿接受的企业戴上, 由此来否认公有制企业扩大规模和提高效率的可能性。¹⁰

由此自然会想到, 由于中国的国情、人的行为方式、经济运行的条件和环境、改革进程和特点等方面的差异性, 既要接受背景完全不同的经济学假设的合理部分, 还必须提出一些符合自身特点的基本假设, 在此基础上也就必然会得出许多不同的结论。在对假设加以修正、有些甚至是作根本的改变之后, 借助更有效的分析工具, 有助于更加客观、深入地分析公有制的效率问题。

三、公有制的产权组织和治理结构最优实现的关键因素

我们把企业中的委托代理关系看作是产权组织和治理结构的基本形式。委托人表示由于富有某种要素而具有支配其他人的权力的人, 代理人为受权力支配的人。我们曾概括出我国公有制企业中委托代理关系的基本类型, 提出了若干假设, 从理论上分析了双向委托代理关系在实现公有制企业产权治理结构(人与人之间利益关系中的权力分布与联系)优化中的重要作用和内在机理, 得出了通过建立双向委托代理关系能提高公有制的效率这一初步结论。¹¹“公”的本质含义是劳动者共同占有生产资料, 由此形成和决定分配关系及与之相应的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积极探索公有制的有效实现形式, 关键在于能否通过优化产权治理结构表现“公”的根本特征。

从产权关系来看, 双向委托代理关系是与公有制相应的产权组织形式, 能有效发挥公有制的优势。其基本特征是实现了劳动者共同占有生产资料, 打破了只有一(少)部分人做委托人, 而另一部分人只能做代理人的产权配置格局和治理结构。形象地说, 在双向委托代理关系中, 每个人都有资格管理他人, 同时也必须接受他人管理。利益关系(以及广义的经济关系)中权力的分配和运用是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博弈, 结构和制度是一定条件下的博弈结果, 而且这又是一动态过程, 所以我们仍可以用动态博弈模型对此作进一步的分析。通过前面对俗定理中 δ 的考察分析, 在分析双向委托代理关系时, 我们应该赋予每个局中人充分的选择权和劳动价值取向, 看到人人都偏好做委托人, 即曾经提出的委托人偏好假设¹²。实际上只要假设每个人的活动都能创造出正的价值, 多一个人就能多创造出一份价值的可能性存在, 就可推导出每个人都存在着偏好做委托人的行为动机。就此而言, 公有制的本质含义既要包括人人都愿做委托人的假设, 又必须具备人人都有资格做委托人的条件。

由于私有制条件下的产权链是以资本为核心要素构建和连结的, 制度造成了财富分配不公, 又被市场的马太效应加剧, 因而一大部分劳动者从根本上被剥夺了实际成为委托

人的可能性。私有制社会表面上人人都可成为资本拥有者从而具备做委托人的资格,但实际上这条路已被切断和堵塞,制度和意识形态在其中也起着关键作用。既然人人都有做委托人的愿望,所以只有当个人主观能动性和成为委托人的可能性不高时(个人效率 < 0),私有制企业才会有较高的效率。一旦切实允许每个人都能成为委托人,公有制产权组织形式就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个人效率 > 0),也就会表现出比私有制企业更高的效率。由此而言,通过建立双向委托代理关系,能优化公有制的产权关系和治理结构,充分显现蕴涵于公有制企业中的高效率。¹⁴由以上的理论分析和从实践情况来看,存在于我国现行公有制经济中的效率低下问题的根本原因并非是公有,决不是像某种理论观点所说的公有制规模越大,委托代理授权链越长,效率就越低。恰恰相反,最本质的原因就在于并没有真正地实现公有,而是用一种不完善的公有或貌似公有的变形制度形式偏离和限制了公有制经济效率的充分发挥。关键在于我们的公有制在产权组织形式和治理结构中是否真正体现了公有,让每一位劳动者都具有做委托人的可能和资格以及存在有效的实现途径。而本文的讨论从优化内部产权治理结构的角度、从理论上积极探索公有制的有效实现形式。这既找到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动因,也更加坚定了改革的目标和方向。

四、双向委托代理关系的实现形式

接下来我们讨论如何实现双向委托代理关系。设在一企业产权组织形式中具有1到T层的多层级委托代理授权链,记第i层的委托人和代理人分别为 P_i, A_i ,相互关系为 $P_i \rightarrow A_i$,而且有 $A_i = P_{i+1}$,第i层的代理人同时又是第 $i+1$ 层的委托人, $i=1, \dots, T$ 。令 $A_T = P_1$,即最终代理人(普通劳动者)成为初始委托人(国家主人),这就从理论上形成了闭合的循环链,任何一经济行为和影响都可在此闭合链中作用任意多次,实现了无穷多次博弈。这样就扩大了博弈均衡的实现范围,提高了均衡收益,可使公有制企业的效率和优势得以充分发挥,实现帕累托改进。

市场经济是能够有效配置资源的一种经济形态和运作机制,但它的模式和所依附的制度基础不尽相同,其与不同的社会制度相结合,必然表现出不同的本质特征。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是以资本为中心要素建构和维持运转的,而要建立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必然要以劳动为中心构建市场体系,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质的规定性。资产所有、利益分配、企业组织、市场规则、各类经济活动和人与人之间的地位关系等一切经济关系的形成,都应以劳动为基本的价值衡量标准,这就为本文所说的双向委托代理关系明确提供了价值取向、制度保证和现实基础等方面的可行性,这也是实现双向委托代理关系所要遵循的根本原则和主要途径。如在认识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建设的关系问题时,通过建立双向委托代理关系,才使民主政治真正有了坚实的经济基础,使民主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充分体现。若要实现

$A_T = P_1$,也只有社会主义才提供了基本的制度保证和可行性。建立双向委托代理关系,关键在于如何使委托代理授权链形成闭环,以便在闭合的委托代理关系链环中使博弈实现无穷多次重复,为我们的上述理论分析提供可操作的现实基础。因此,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强化民主监督,建立企业家市场,¹⁵保证劳动者的主人翁地位和相应权力的行使,以劳动为中心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是实现双向委托代理关系的重要基础和制度保证。而微观层次的实现方式和途径是要从企业的产权组织和治理结构角度积极探索公有制的有效实现形式,建立以劳动要素股和劳者有其股为主要特征的社会主义股份制等形式的企业。如此才能使公有制企业的产权组织和治理结构与社会生产力水平的多层次性和所有制结构的多样性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重要特征相适应。

由本文的论述可以明白这样一个道理:真正实现劳动者为主人或者说是以劳动要素为中心的经济形态和运作方式比历史上任何其他的经济组织形式都更先进更高效。进一步从前面运用动态博弈模型的理论分析得知,¹⁶信念直接影响着局中人(利益主体)的行为目标和策略选择,甚至可以说是预期形成的主导因素之一,而预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动态博弈模型中 δ 值的大小,所以,信心(信念)也是公有制优势真正实现的关键因素之一。本文的讨论运用博弈论方法仅提供了对公有制企业中的产权组织形式和治理结构分析的基本模式,但对公有制经济更广泛范围的分析有启发意义,如更一般的公有制经济中的决策利益分配等方面如何体现公有制,可用同样的观点和方法进行分析,有关研究结果也将会更有力地支持本文的结论。

注释:

王国成:《从一般均衡到对策均衡:经济学的世纪抉择》,载《天津社会科学》,2001(1),55~59页。

王国成:《阶梯西方经济学——前沿专题》,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9。

¹⁵ D. Fudenberg, and J. Tirole, Game Theory.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The MIT Press 1991

¹² 张守一主编:《现代经济对策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

张维迎:《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¹⁰ 张维迎:《公有制企业的委托人——代理人关系:理论分析和政策含义》,载《经济研究》,1995(4),10~20页。

^{11 13 14 16} 王国成:《公有制企业的内部治理结构与双向委托代理关系》,载《中国经济问题》,1999(4),14~20页。

(作者单位:中央社会主义学院 北京 100081)

(责任编辑:金萍)